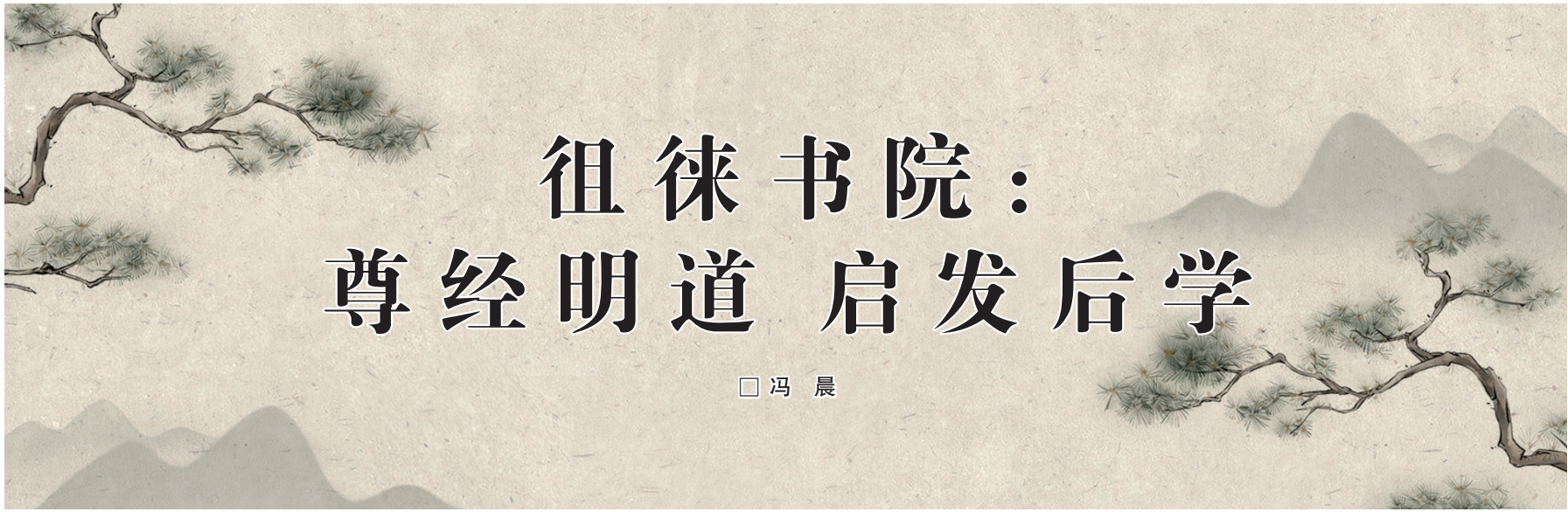




祖徕书院因祖徕山而得名。祖徕山位于山东泰安市，其主峰太平顶与泰山玉皇顶对峙。早在《诗经》里就有“祖徕之松，新甫之柏”的赞美。祖徕书院设于祖徕山西北长春岭。今天，在长春岭处，只有几间房屋，几块断碑。此处被称为“作书房”，这就是祖徕书院部分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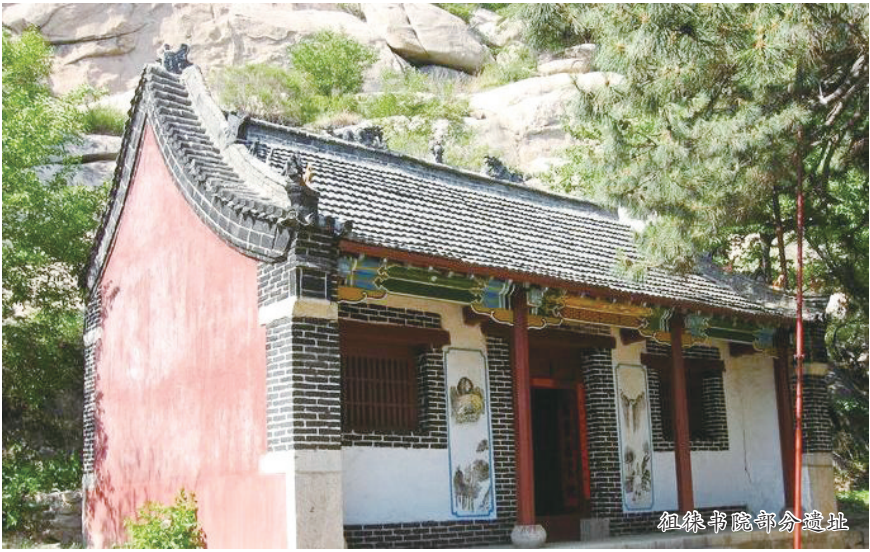
祖徕春秋

南宋范成大在其《骖鸾录》中道出天下有四大书院，即祖徕、金山、岳麓和石鼓，祖徕书院排在首位。祖徕书院的创办者叫石介。石介（1005—1045年），字守道。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历任郾州、南京推官。因他曾在祖徕山下讲学，学者称之为“徕先生”。石介20多岁中进士，曾任国子监直讲，官至太子中允。他为人耿直，多次撰文指斥时弊。康定元年（1040年），石介在老家服丧期间，创建祖徕书院，聚徒讲学。

祖徕书院的创建与发展与孙复密切相关。孙复（992—1057年），字明复，北宋晋州平阳人。据记载，他因家境贫寒，曾受到范仲淹接济。孙复一生治学勤奋，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官至殿中丞。

宋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石介调任南京为官，结识了因贫困而流落于此的孙复，两人一见如故。第二年，孙复由石介引领来到泰安，筑室聚徒，开始讲学。两年后，孙复又在岱庙东南兴建学馆，名之为“信道堂”。从此，孙复广收生徒、讲学授经。后来，岱庙扩建，信道堂并入岱庙院内，孙复就到泰山南麓的栖真寺，聚徒讲学，学者们也因之称孙复为“泰山先生”。

石介作为京东名士，主动布衣农孙复为师，其意甚诚，欧阳修说：“介执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则立，升降拜则扶之，及其往谢也亦然。鲁人既素高此两人，由是始识弟子之礼，莫不叹嗟之。”孙复因此很快名扬天下，石介的行为也被传为佳话，天下士人多慕名汇集于泰山徕，读书求道。因师徒两人为学谨厚，学问见解一致，所形成的学



祖徕书院部分遗址

派被称为“泰山学派”。

在泰山徕的众多学子中，有一位名叫胡瑗。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如皋人，祖籍陕西安定堡，被称为“安定先生”。胡瑗在泰山苦读十年不归，终成学问丰厚、通古博今的学者。读书期间，无论生活多么艰苦，胡瑗总不废学业。据记载，胡瑗每接到家信，只要看到书面上有“平安”二字，就把信投到书院旁的溪涧之中，以免读信分散精力。后人遂将胡瑗投书之地名为“投书涧”。胡瑗以及以上提到的两位“先生”，被后人称为“宋初三先生”。也许因这“三先生”，徕书院名声更为广播。

承道明道

在孙复、石介所处的时代，佛道二教兴盛，他们意欲通过共同努力，重振儒学。师徒二人主动承担起了这个历史责任，他们与范仲淹等人一起兴起了“复古劝学”的活动。与此同时，他们提出了接续儒家的“道统”主张，甚至还效法唐代韩愈，列出了儒家“道统”的名单。“信道堂”取名“信道”即表达“信守道统”之意。石介也努力为儒家争取正统，言必称道，他曾说：“吾圣人之道，大中至正、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他坚持的道是孔子之道，此

道既关乎人伦社会，为君臣、父子、夫妇、朋友、长幼设立规范，又为政治统治确立社会秩序，他说“治人之道也，一日无之，天下必乱”。于是，他也为这个道设立了道统，此道统包括从伏羲到孔子诸位“圣人”，以及从孟子到韩愈等众多贤人，甚为详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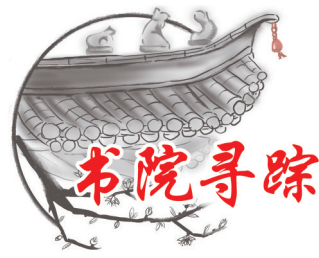
为更好发扬儒家道统，孙复、石介，以及胡瑗等人身体力行、尊经明道，开启一代治学新风。孙复作为北宋著名的经学家，其关于《春秋》的研究为学界所重。今存的《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是他学术思想的代表作。他认为孔子作《春秋》是以“天下无王而作也”，在孙复看来，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于“尊王”，是由于当时王室衰微，诸侯强大，王权削弱，礼崩乐坏。因此“尊天子、黜诸侯”应该是孔子《春秋》的立论基础。因此，孙复突出孟子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思想。同时，他对传统经典注疏有过激进的批判，并跳出传统章句训诂的风气，主张“文以载道”。他说：“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朱熹称赞孙复：“近时言《春秋》者，皆是计较利害，大义却不曾见，如唐之陆淳、本朝孙明复之徒，他虽未曾深于圣经，然观其推言治道，凛凛然可畏，终是得圣人个意思。”石介也认为，道应该“万世可长行，一日不可废”，而

文则需要“本于教化仁义，根于礼乐刑政，而后为之辞”。朱熹对石介评价也很高，认为他是一个刚介的，具有如孟子所说的“不动心”的人，是超过韩愈而仅次于“关、洛诸公”的第一等人。胡瑗的学术也以经学见长，在解经上，他强调“以理为胜”，这与传统训诂之学有很大不同。同时，胡瑗的易学也有自己的特点，他不同于西汉灾异之说、东汉谶纬之说，同时也不专守玄学观点，而代之儒家纲常名教之说和性命道德之言，颇具后来的道学意味。

启发后学

宋明理学的兴盛与泰山徕书院的学术宗旨和治学风格关系密切。孙复、石介在泰山兴办书院，讲授儒学，开启道统，发扬经学的教化作用，从经典中发现性命之理，这种治学方式对后世影响很大。

首先，泰山学派的重道精神对宋明理学思想的开辟起到了先导性作用。宋初的这几位先生，对于经典，以明道为主，不恪守一家、一经，博采众长、汇通群经，构建儒家的道统。这一点对后来宋明理学家们汇通各家学派，丰富发展儒家心性义理之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泰山学派明体达用、文以载道的“道论”确立了后来宋明理学重要的学术方向。还有，泰山徕书院本身这一教学形式，对理学的发展和传播也起了示范作用，以至后世理学家多以书院为依托进行学术研究、教书授课。因此，泰山徕书院以及由此形成的学派，不论是对后来儒学的道统延续、学理的创新还是办学形式的确立，都具有不容低估的启发作用。



新媒体艺术与传统文 化融合的四 种路径

□ 刘晓娟

新媒体艺术是当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艺术创作者依托新媒体技术而创作的含有审美价值的艺术。新媒体艺术与传统文化融合至今，已产生了大量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探索了声、光、感三维的存在，丰富了人民群众的审美体验。新媒体艺术与传统文 化的融合是沿着发挥互联网优势、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养分、引进人工智能的路线行进的，探索其融合规律，主要有四种融合路径，即多元化融合路径、技术化融合路径、个性化融合路径和市场化融合路径。

多元化融合路径。多元化融合路径是新媒体艺术与传统文 化的融合中较为常见的路径，其主要特点是融合的元素多，也包括融合内容、融合形式的多样化。这种融合路径适用于以营造全方位审美艺术空间为目的、以展现多种艺术样式为要求的新媒体艺术与传统文 化的融合，如《国家宝藏》这类文博探索节目，故宫博物院举办的《宫里过大年》数字沉浸体验展等文化活动。这种融合路径在新媒体与传统文 化的交流中并不排斥传统媒介或现当代文 化的参与，它以兼容并包的姿态吸收各种富于表现力

的艺术原料，通过重组、变形等手段塑造复合型的新媒体艺术，丰富审美活动过程中的艺术形式，使观赏者能够在多重艺术世界中沉浸和遨游，从而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 化需求。

技术化融合路径。技术化融合路径要求新媒体艺术与传统文 化密切结合，要求技术人员通过精进的新媒体技术手段将传统文化以恰当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以实现二者在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等多方面的深层次融合。技术化融合路径将文字、图像、音效等多种艺术媒介融合起来形成新的媒介，以传达艺术观念，使传统文化得到全新的表达。这一路径注重融合过程中的有效性，即艺术语言与技术语言的有效互融，如出土文物与文 化遗产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将其搬进数字博物馆，使百姓足不出户就可以领略中华文 化的风采。要顺应数字文 化发展趋势，改造传统文化产业业态，为艺术创造与艺术传播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同时还须强化艺术理念的核心地位。

个性化融合路径。个性化融合路径的特点是融合成品富有创造性和独特性，其目的在于创造出符合艺术家审美

趣味的新媒体艺术。当前，艺术界关注个性化表达的艺术理念逐渐加深，而个性化表达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利用新媒体技术来描摹空间感和时间感。例如，一些作曲家通过拼接和重组等技术手段将古典乐器的声音融于电子音乐中，向听众展示他们对于古、今乐器对话的思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在文艺、科学领域中提出的基本方针，个性化融合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双百”方针的继续推进，发挥艺术家们的主动创造性，多种艺术理念均可得到彰显，艺术亦可呈现出多种风貌。值得注意的是，个性化融合路径并不意味着艺术创作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传统文化与新媒体艺术进行融合，而是要准确把握群众的精神文 化需求，传递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将自身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思考真正融入新媒体艺术中，以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市场化融合路径。市场化融合路径建立在文 化艺术日益大众化的社会现状之上，这一路径要求新媒体艺术与传统文 化的融合要兼顾文 化、艺术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我们应当认识到，即使是在市场化融合路径中，文艺也应当遵循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新媒体艺术与传统文 化的融合应当文、质并重，艺、德兼修，它们不仅要要在市场上受到欢迎，更要在艺术水准和社会效益上达成目标，从而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此外，市场化融合路径还可以与文 化产业的转型升级相联系，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促进文 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结合，这样既可以通过传播地区民俗文化，又可以促进地区旅游业发展，同时也可以使人们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体验中华文 化的深邃与悠长。



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伦理道德教育。《大学》开篇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论语》中记载，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中国古圣先贤在体悟“道”的基础上，把人的“德”统之于“仁”，并具体在社会立身处世、齐家治国时所体现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方面，也称为“八德”。正是这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圣贤文化，使中国被誉为“礼义之邦”，在世界文明史上书写了不朽篇章。

在《群书治要·傅子》中，阐明了实现社会大治必须具备的条件：“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这说明，贤明的领导者必须通过推行好的制度，才能达到社会安定的结果。《群书治要·孙卿子》中指出：“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源也。”说明良好的法律是治理的开端和凭依。如果没有良好的法制，就会使得治理无所依循，甚至会出现《墨子》中所说的：“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现象。可见，良法对于善治而言是必须的，因此必须重视法制、监督机制的健全和完善。但并不是只要有了好的制度，就能够实现社会大治，还必须有德才兼备的辅佐之人推行好的制度，而德才兼备的圣贤君子唯有依靠道德教育才能培养出来。

《群书治要·淮南子》强调：“不知礼义，不可以刑法。”也就是说，公平的制度必须得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设计出来，而即使公平的制度设计出来了，也必须有正义美德的人才能实施到位。因此，需要强化道德教育对法治的支撑作用。如果忽视了道德教育，即使有了好的法制也难以推行并达到国家大治的结果，还会出现以下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应当引起重视。

其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只是因为惧怕刑法的处罚免于作恶，但是没有羞耻心，甚至还以作恶后能想方设法地免于刑法的处罚而沾沾自喜，自以为聪明。这表现在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即没有触犯法律但不道德的行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比如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之人关进监狱，但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依然难以挽救因为人的良心泯灭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

其二，难以培养出品德高尚的圣贤君子。《群书治要·淮南子》中说，即使刑法可以把不孝者处以死刑，但是不能把人培养为孔子、墨子那样具有高尚德行的人；即使法律能够给偷盗者判以刑罚，却难以把人培养成为伯夷那样具有廉洁品质的人。孔子培养的弟子3000多人，他们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社会大众的表率，都是因为教化所成就。

其三，难以达到“礼义积而民和亲”的状态。《群书治要·汉书》中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意思是说，用礼义治国者，积累的就是礼义；用刑罚治理国家者，积累的就是刑罚。刑罚用多了人民就怨恨背叛，礼义积多了人民就和睦亲爱。本来世代君主都想让人们德行美好的意愿是相同的，但用以使人民德行美好的办法却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来引导，有的是用法令来驱使。用道德教化引导，德教和谐时人民的精神状态就表现出欢乐。

其四，不能达到“不忍欺”的最高管理境界。《群书治要·史记》记载，孔子的弟

强化道德教育对法治的支撑作用

□ 刘余莉

子贱通过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达到了高于“不能欺”和“不敢欺”的“不忍欺”的管理境界。在《群书治要·体论》中也说道：“德之为政大矣，而礼次之也。夫德礼也者，其导民之具欤。太上养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其次使民交让，处劳而不怨，此治之次也；其下正法，使民利赏而欢善，畏刑而不敢为非，此治之下也。”意思是说：用道德教化是第一位的，礼法则紧随其后。道德与礼法都是引导人民的工具啊！道德教化使人民日益转向善良，却不知道自已为什么会转向善良，这是最好的治理（正己化人，无为而治）；其次，使人民互相礼让，身受劳作之苦而并无埋怨；再次就是用法规来纠正，使人民因利益得到保障而喜欢从善，因畏惧刑罚而不敢做非礼之事。

因此，古代 的圣王，无不把教化人民作为治国要务，设立太学在国都推行教化，设立庠序（地方学校）在地方教化人民。通过以礼乐教化，可以把人培养为文质彬彬的君子。在《周礼》中就详细记载了掌管教育的各级官员以及教授的内容，这种道德教育起到了净化人心、防微杜渐、导人向善、促进和谐的作用。不仅如此，良好的道德教育，还可以“绝恶于未萌”“禁于将然之前”，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使人不仅不敢作恶、不能作恶，也耻于作恶，不想、不愿作恶。

